



新农村教育研究丛书

总主编 \ 周险峰

走出边缘

——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

彭拥军 \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所

走出边缘

——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推力

杨东平 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新农村教育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研究”成果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科技大学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成果

总主编 \ 周险峰

走出边缘



——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

彭拥军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彭拥军 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609-6465-2

I. 走… II. 彭… III. ①乡村教育-研究-中国 ②农村-社会流动-研究-中国
IV. ①G725 ②D66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618 号

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

彭拥军 著

策划编辑: 周小方

责任编辑: 殷 茵

封面设计: 陈 静

责任校对: 史燕丽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87557437

录 排: 武汉兴明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插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行业的社会流动，以及农村社会自身职业的结构性升级是我国成功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农村社会流动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社会景观。由于人口结构形态、社会结构形态以及制度性安排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我国的农村社会流动必然是中国式的。

本书从教育的视角，对我国农村社会流动中的教育张力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贯通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农村、农村社会流动等概念在演变过程中含义的变化以及乡村熟人社会心理地理连续体关系的变化等细节入手，通过对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人群在社会流动中身份地位的差异性变化的描摹和分析，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流动多姿多态的面貌，揭示了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的有为、无为或可为。

本书理论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到，文字表达力求通俗。

本书可供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研究人员以及对农村、农村教育或者社会流动感兴趣的各类读者阅读和参考。

总序

农村教育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范畴。农村教育概念的提出,显然基于城乡差别或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及寻求其现代化变革的冲动这一历史事实。

所谓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的二元性必然造成差距明显的“城”、“乡”社会发展的“二元”形态。例如,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就被认为有如下表现: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①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学术领域如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区域科学等,都比较注重研究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问题的时候,这些理论家们倾向于认为,这种二元状态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然包括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想推动其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人们对走出二元社会结构有很高的预期,有学者认为,走出二元结构既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又有利于农业面貌的改变、工业效益的提高、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心理的平衡和城乡环境的改善等。从根本上而言,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试图实现二元社会结构的现代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735820.htm>.

化转换,虽然,这种转换有我国自身发展的特色追求。

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经历过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发展轨迹。最初提出的二元结构,主要是指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元结构研究几乎成为一种研究范式或说研究方法论,这种二元结构研究逐渐延伸到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①

教育研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事实,以及受相关研究的启发,1991年在山东泰安召开的第一次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农村教育”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②。2003年1月20日至23日国际农村教育研讨会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共同主办的。大会的主题就是教育为农村转型服务。从中不难看出相关影响。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学界对什么是“农村教育”,并无共识。1991年在山东泰安召开的第一次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的“农村教育”是指“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为了避免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对立起来,在2003年河北保定召开的国际农村教育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从“为农村发展服务的教育”这一起点出发,农村现在越来越需要高等教育,与农村有关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都应纳入“农村教育”之中。据称,这些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肯定,于是大会决定把“农村教育”的定义改为“包括扫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术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从内涵上看,这种界定蕴含了一种试图将“农村教育”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在农村的教育”变为“为了农村发展的教育”的价值追求。其用意是很好的,其实际意义也是很明显的。

不过,本人倒是觉得,把农村教育定义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农村的区域性教育”^③更有实际意义。原因很简单,区域性首先表现为地域界划,其中蕴含着区域发展的综合性的发展特征。“农村”与“城市”本身首先就是一种区域性概念,正是因为区域性发展差异或者说是发展不平衡才有“城市”和“农村”之别;也正是因为这种发展差异或不平衡,才有“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之分。强调差异或差距,并不就必然强调对立,而是更好地着眼于农村教育的现状(这种现状包括现有基础、发展条件或水平差异等),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发展农村教育。对于“在农村中的教育”,我们只有在与“城市教育”发展差异或不平衡的比较中才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4768.html>.

② 孙志诤.2003年国际农村教育研讨会综述[J].职教论坛,2003(5):32-33.

③ 李少元.农村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

会有对它的清醒认识,否则,过于强调“为了农村的教育”而泛化农村教育概念,很容易造成决策偏差,比如投资方向偏差等。近年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城乡差别依然明显,甚至有扩大趋势,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这不能不说与某些认识偏差有关。“新农村教育研究”丛书所称的农村教育首先是指“在农村中的教育”。这种教育正随着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而寻求变革,或者说为了整个社会的转型而正寻求自身的价值定位、实质性改变。这样看来,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我们似乎可将农村教育定义为“在农村的教育”、“为了农村的教育”、“具有农村特点的教育”。强调它是“在农村的教育”,主要侧重于其现有的发展状况,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强调它是“为了农村的教育”,主要侧重于扩大农村教育的范围,以凝聚发展农村教育的社会或教育力量;强调它是“具有农村特点的教育”,是为了避免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单一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我以为,当前农村教育发展,首先要特别留意那些“在农村中的教育”,这是正确把握农村教育问题的关键。

农村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四民”分业定居的倡议,教育自然与“农”有关。不过,那时的“农村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农村社会教育,其形式比较单一。到近代工业产生以前,“农村教育”远远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我国开始出现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真正分野并引起社会的深切关注,应该是在20世纪初。当时出现了大批关注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教育、实践农村教育的教育思想家和学术团体,曾掀起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农村教育思潮,其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已经成为丰厚的历史遗产。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极力解决的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发展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教育也因此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

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境遇和制度安排,我国“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农村教育发展依然困难重重。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走出“三农”问题、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困境呢?有人曾对我国二元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过大致梳理,认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是城乡差异明显和城乡分隔刚性,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是城乡差异更加明显化和城乡分隔开始弹性化。走出二元社会结构应该树立城乡一体的新观念,创建促进城乡一体的新制度和新机制。

这样看来,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城乡教育的差距的缩小甚至消除,从根本上而言,有赖于社会新观念、新制度、新机制的产生。

促使社会新观念、新制度、新机制的根本性形成,教育无疑责无旁贷。因为在当代,教育被广泛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成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当“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农村教育问题也依然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研究。湖南省普通高等

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正是在这种时代的感召下成立的，也正是出于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来从事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的。“新农村教育研究”丛书也正是想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而面世的。

农村教育是一个结构性概念，“新农村教育研究”丛书试图根据农村教育的结构类型，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并且试图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以及时追踪或把握农村教育中的发展问题。这样看来，“新农村教育研究”丛书将是一个开放的结构空间，欢迎有识之士的加盟。消除教育发展差距，共谋社会均衡发展，这是编辑本丛书的旨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很热切的期盼。

是为序。

周险峰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录

引言:一个局内者与局外者的自我交代	/1
第一章 研究构想:教育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流动问题域	/9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10
第二节 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	/16
第三节 拟用研究方法的检讨	/23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30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农村社会流动的理论架构	/33
第一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关联概念	/34
第二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理论着眼点	/41
第三节 调查的展开	/51
第三章 实证研究(上):农村社会流动的定量分析	/61
第一节 调查区域与全国乡村组织的人口相关数据比较	/62
第二节 调查区域与全国农村社会流动状况对照	/70
第三节 教育作为隐性力量的农村社会流动	/75
第四节 教育直接推动的农村社会流动者	/88
第四章 实证研究(下):农村社会流动中涌现的乡村名人	/101
第一节 精明的张氏家族	/102
第二节 在探索中致富的魏老板	/107
第三节 在流动中沉浮的林知青	/111
第四节 现代农业的追梦人甘师傅	/115
第五节 带头脱贫致富的张书记	/120
第六节 为声誉拼搏的魏政协	/124

第七节 现代企业的探索者刘老板	/128
第八节 技术强厂的颜厂长	/131
第五章 宏观观照下的农村社会流动的反思	/137
第一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结构与制度依赖	/138
第二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农村发展	/150
第三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乡村政治重塑	/155
第四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农村经济再造	/160
第五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乡村文化调适	/164
第六章 农村社会流动研究的检讨	/169
第一节 持续有效的教育供给:农村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	/170
第二节 制造农村出身的中产阶级是衡量 农村社会流动效果的试金石	/177
第三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有序性与合理化	/181
附录 A 调查区域村民登记册(示例)	/193
附录 B 调查摸底名册(示例)	/196
附录 C 调查区域人口的年龄状况汇总表(示例)	/199
附录 D 调查区域人口的性别状况汇总表(示例)	/201
附录 E 调查区域家庭人口分布汇总表(示例)	/203
附录 F 流动人口地域分布(不含大中专生)	/204
附录 G 全镇流动人口性别年龄汇总表(示例)	/206
附录 H 全镇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汇总表	/208
附录 I 全镇流动人口年龄学历性别汇总表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19

引言： 一个局内者与局外者的自我交代

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村是社会的荣耀,农民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农民在我国士农工商的序列中处于第二的位置。我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业人口一直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现状一直没有改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农村人口最多,但农民表达自己权利的机会最少,人们对农民的深入了解也甚少,不知道究竟从哪一天开始,农民居然已经被视为懒惰、无知和肮脏的代名词。对农村和农民的误解和偏见说明农村已经褪去了昔日的荣光,退却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农村教育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也逐步处于教育体系或体制的边缘地位。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①。农村发展的滞后虽有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取代的宿命性因由,但也不能无视农村所承受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代价,不能任凭农村发展与现代社会相断裂。实际上,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真正的现代化。所以,无论基于现代化顺利实现的考虑,还是基于对农村应有的社会关怀或者其他合理原因,我们都有必要了解农民的亚文化,理解改变农村和农民行为的重要性。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大事,如乡镇企业的涌现、农民的社会流动和新农

^①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66.

村建设。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出现,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也随之而来。农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城市的发展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农户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平衡;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长,而农业和农村自身对知识的吸纳能力没有得到明显增强,农业增产不增效的情况仍然存在,农村在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相对剥夺感有所增强。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农村一度与城市差距缩小的情况,在中部等很多农村地区又被进一步拉大,并且伴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社会流动,农村的空壳化和凋敝化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出现。

我们作为见证中国现代化快速变迁的一代人,所见证的既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我们既是现代制度的制定者和见证者,也是现代制度的遵循者和参与者。技术和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化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作为农村社会流动的研究者,我自身是研究的主体和“工具”,因为自身的经历和兴趣,使我把研究的目光投入到这一问题领域,我将在研究中表明我的立场并表达我的观点,使该研究成为我的替身;但我的所思所感又来源于农村社会流动的生活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过是用来表明这一问题领域所发现或存在问题的工具而已。与此同时,我自身又是研究的素材。作为研究的素材,我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见闻,尽管其本身只是中国或者中国农村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因素,但这也同样记录着历史,沉淀着历史。作为一个“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农村社会流动者这样一个事实,它本身就代表着农村社会流动的一种类型或某种样态。

不管怎么说,向上社会流动总与个人获取资源的途径相关联。一般而言,获取资源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途径是通过继承或先赋因素来获得资源;第二种途径是通过自己的资源投资和自身努力来获取;第三种途径是实施交换,即通过金钱支付或者资源交换实现个人资源的转移。从历史的角度看,实现社会流动的方式因社会的不同而呈现差别。在远古时代,个人在捕猎和种植等方面杰出的体能与智能是赢得社会地位或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教会是拓通社会阶层的通道;在依靠武力开疆拓土的时代,军队成为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工业革命后,在贸易和制造业上的成功,往往成为一个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途径;在传统中国社会,权力与知识的结盟是因为知识可以为权力所用,可以增强权力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权力可以保证知识产生更大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唐代“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说法比较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政治景观,教育成为获取权力、财富、声望乃至其他重要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① 知识与权力结盟,使教育成为提升个人乃至家庭或家族地位和声誉的重要手段。在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权力的实现产生了重要作用,儒术也被政权所重视。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向上社

^① 彭拥军. 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

会流动的途径更多，球技、演技甚至外表漂亮都可能成为社会流动的手段或者促进社会流动的力量。总而言之，某一方面的独特性和突出性，只要能够被社会认可或者具有市场价值，都可能引起个人的向上社会流动。教育在范围广大的地区产生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是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分不开的，而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人权思想的广泛传播，二是科学技术因素的推动，三是民主国家建立和建设的影响。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教育逐步成为影响亿万人的事业。从个体意义上说，教育改变人的气质，影响人的命运；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改变，反映着社会文明发育的程度和水平。

作为一个“乡下生，乡下长”的个体，我自己的奋斗经历和所见所闻，实际上也见证了我们所处的这一阶段的农村社会流动。我小时候，“吃国家粮”的父母才能“天然”地生出“吃国家粮”的子女。尽管我当时还是少不更事，但已经能够清晰地意识到一个农村孩子能够吃上国家粮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初中毕业后，我进了师范学校，圆了童年就有的“吃国家粮”的梦想。记得收到录取通知后，我游戏的伙伴、左邻右舍以及亲戚都来祝贺。有了一个就在身边的“榜样”，邻居的弟弟妹妹们都更加努力地学习，后来也有很多人纷纷考上了大学或中专。我们这个常住人口一直不超过70人的小小生产队竟然先后考走了10多位大中专生。可以这么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农村青年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把“通过读书进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作为最直接的奋斗目标。这一现实目标，使多少农村青年有了克服生活和学习中一切困难的强大动力。他们中间，也产生了许多成功者。

除了考试这条路外，当时能够走出农村的还有参军等少量的制度化渠道。我们村也有人通过当兵留在了城里而成为城里人。但是，这种人实际上更少，在我们村就只有几个，所以他们同样是我们心目中的名人。我们父母或祖父母辈还有几个人是通过招工而进入城里的，因为这些人已经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他们只是保留在村落传说的故事中，已经难以激发我们发自内心的触动。出身农村的漂亮姑娘尽管多了一条路，可以嫁给城里小伙而成为城里人，但在当时，连城里的残疾人似乎也看不起农村姑娘，因为农村姑娘只能生下农村户口的孩子。所以，在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世界和记忆当中，“做城里人”和“吃国家粮”对我们大多数出身农村的人来说，实际上还真是可望而不可即。

也许是没有更多的选择，读书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了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农村子弟只能靠发奋读书。正是为了实现心中积蓄已久的梦想，我在回家乡工作6年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国家实际上已经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农村正在一步步走向富裕，人们再一次对农村生活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对未来满怀积极向往；而那些没有通过上中专或大学而成功进入城里的人，也开始大大方方地奔向城市和发达地区。

但是，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顺当。那时候，还把外出务工的农民视为“盲流”。每当回家碰到外出务工、经商回来的

熟人时,我都能听到他们诉说在外面所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包括在旅途上遭人白眼甚至被火车站工作人员无情侮辱,在工作中受到各种侮辱和盘剥。因为身处外地,他们对这一切往往只能忍气吞声。这些流动到外地或城市的人,实际上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在一段时间内也产生不了成为城里人的现实愿望(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无法实现),其实也就是缺乏成为城里人的身份认同感。意识到自己的成员身份并认同他自己的阶级,这是一个必要条件。^① 尽管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随着他们的一次次外出打工而逐步有所改善,但他们在言语之中还是流露出对我们这种通过考试改变农民身份的人的羡慕之情。在农村人心目中,普遍认为靠出卖力气外出打工是短暂、不稳定、没有前途的无奈之举。我家乡有句俗语叫做“力大不发家”,这句话的意思是,光靠出卖体力不可能让家庭真正走向富裕。

可以肯定地说,借助教育手段或职业技能或者单纯凭借体力等手段而实现的不同形态的农村社会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原因。我们如何去考察和反思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但就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引起的失范和冲突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变迁本身需要合理性回归。不同流动依据产生的农村社会流动的不同形态和结果,让我联想到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曾对美国的职业分层与学历的关系所做的研究。他认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教育学历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 0.73。^②

单纯的农民社会流动,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真正纳入既存社会制度框架,更难以受到这种制度的直接保护。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获得了单纯农业劳动不能比拟的收入。在读研的时候,我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家乡的楼房在增加,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红砖水泥结构的楼房基本上取代了泥土结构的老式房子。在城乡比较意义上看,农村发展一度进入了黄金阶段,至少在住房水平上曾经超过城市。几乎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家里的单车、手表和缝纫机这老三件也逐步被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等取代。尽管农村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人们的自我认同感和满足感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村家庭的非农性收入越来越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城乡之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由于农村社会流动而形成了更加密切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一步步向纵深推进,农村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农村由于自身的分化和改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订单农业等新事物开始大量出现,人们的交往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化,已经有点像罗吉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农村人口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③。农村熟人社会结构开始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

① 戴维·格伦斯基. 社会分层[M]. 王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

② 刘慧珍. 教育社会学[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18.

③ 埃弗里特·M. 罗吉斯,等. 乡村社会变迁[M]. 王晓毅,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1.

生人社会的方向转向。

与此同时，大多数自由流动的农民，仍旧没有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或顺利地发达地区扎根，而那些通过读大学（甚至中专）进入城市和流向发达地区的人，则顺利地成为城里人或者几乎能够像当地人那样享受现代生活。这些出身农村的大学生，仍旧受到乡亲们的羡慕。这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和他的同事们在《谁将领先》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社会分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个青年人的最终地位和工资收益的最明显可见的预兆就是他的受教育年限。”^①

可以肯定地说，不同时期不同形态农村社会流动的出现，使我产生了对农村社会流动问题进一步深入和系统调查、探讨的愿望，希望从教育的视角来探讨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的现实作用和潜在影响。在前一阶段，我曾关注过农村出身的不同年代的“大学生”并做了相关研究。当然，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我国的快速推进，大学生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读大学对农村人来说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和某种范围内丧失了昔日的那种吸引力。事实上，由于引起农村社会流动的力量在逐步呈现多元化格局，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一条通天大道；另一方面，农村遭受智力剥夺和青壮年劳动力剥夺的消极后果似乎正在得到改变，在农村一度出现的走向凋敝化、空壳化的现象在我所调查的范围内得到明显纠正。面对这种快速变化，我感触很深。在博士后研究课题的确立过程中，我的学术联系导师吴康宁教授对我继续对农村社会流动这一问题领域进行探究给予了积极肯定，希望我在核心问题的提炼、关键概念的澄清以及教育社会学学科意识的体现等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并给予悉心指导。

诚然，我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过程中，急剧加速的城乡社会流动和农村向发达地区的社会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个重要社会变化之一。它不但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也表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重组。当代农村社会流动既是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也是农民转换身份的结果；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历史前提和过程。农村社会流动是农村需求变化自身演进和工业化、城市化诱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流动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它的外在尺度之一就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不仅仅是把农村人口纳入城市版图或者农村具有城市一样的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观念上融入城市，在制度上融入城市，在个人生存发展的能力上能够真正融入城市。

当然，农村社会流动除了农村向已有城市的流动外，还有农村本身的城镇化问题，这种农村结构性上升的社会流动也同时包含着身份转变。在理想状态下，教育引起的农村社会流动不应该单纯表现为农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也应该渗透到农村职业地位提升或职业形态改变之中，但由于我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短缺或社会中高层职位的严重不足，这种现实状况必然造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对教

^① 何建章. 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175.

育(比较直观的是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不足,它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导致教育尤其是高层次教育引发的农村和欠发达区域的人才社会流动是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教育引起的农村社会流动,从积极方面看,可以拓通农村与城市或发达地区联系的渠道,有利于把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带回农村,实现文化反哺、信息回流甚至技术回流,并可能形成新的城乡之间、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产生激励和示范作用;但也可能造成对农村资源的剥夺,尤其是智力剥夺,造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的严重流失。事实上,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本身的职业地位并没有在农村社会流动过程中得到明显提高,一度大量出现的“空壳村”和农村凋敝现象实质上与农村教育的“去农化”有着内在关联。我国高等教育引起的农村社会流动不是农村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而是城乡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制度框架上的不平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后果。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农村社会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快乐或苦痛,也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有些问题具有发展过程中的共性。

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农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法律和制度一直未能出台(如美国的《莫里尔法案》即《赠地法案》),促进了教育为农村培养许多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了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转变,而这种转变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人口的减少,也就是说,进一步提高了农业品质,并促进了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在我国,只要高等教育为城市、为工业发展服务的主要方向不变,专业化的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的作用就必然限制在提高大学生及其相关利益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直接改变农村本身地位不高这一基本状况。

从教育的视角看,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下,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的影响是农村的部分人口通过高等教育渠道而被纳入国家的制度性框架,从而获得制度所带来的相关资源和相应的法定身份。但在当时,农村人主要是通过教育渠道获得各种资本(主要是必要的文化资本,这是社会流动的必备条件,还有非教育因素的社会资本,如本来就有的社会网络以及邻里关系等),从而改善自身的社会流动能力。除此之外,个人实际上还是缺乏对资源和地位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都十分明显)。个人一旦通过教育渠道获得了特定的身份或进入某一单位和行政体系后,其相应的地位和社会资源就由国家来保障(即端上了铁饭碗),但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所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或提升主要不再是由于自身的努力、自身的创造性或贡献了。人们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单位具有什么样的行政级别比个人的奋斗重要得多。当努力和回报不相称,而人们的利益观念又已经觉醒时,人们就容易把利益矛盾指向国家、指向政府。

随着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逐步得到加强。出身乡土社会的、因教育的制度化提升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大中专生,他们的行为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乡土社会的心理文化印痕。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人情特点等,都隐含着解读教育引起农村社会流动的某些线索,而对农村中其他社会流动者来说,教育则成了一种隐性力量。